

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

——忆解放前重庆的文化活动



重 庆 出 版 社

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

——忆解放前重庆的文化活动

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丛书编委会

翁植耘 屈 楚 编 著
周特生 冯克熙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重庆

封面设计：王仲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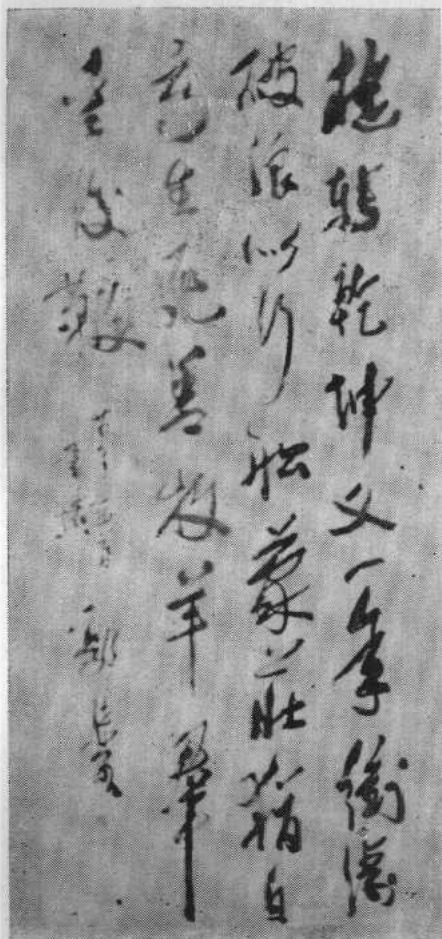
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印 制 一 厂 印 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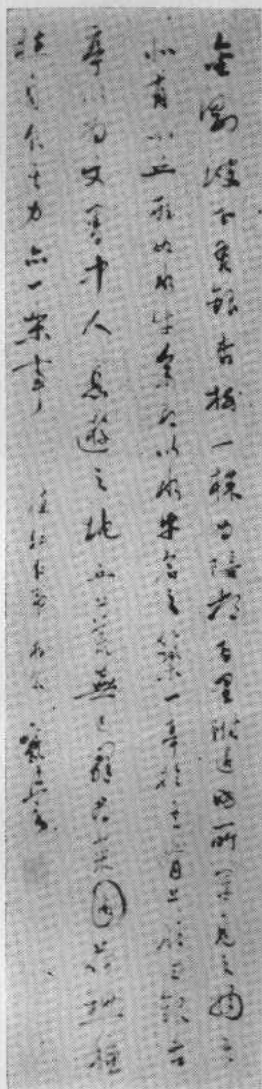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3.375 插页3 字数68千
1982年9月第一版 198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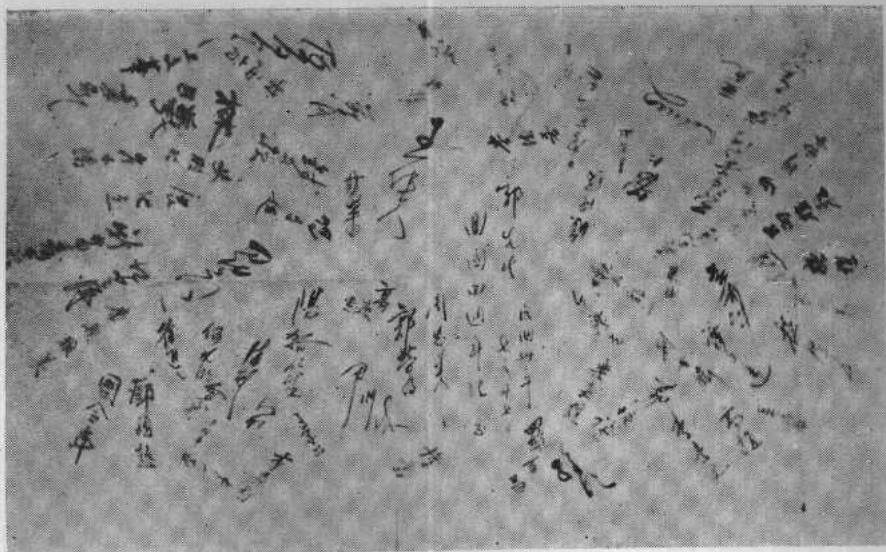
书号：11114·11 定价：0.33元



一九四〇年除夕郭老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晚上即兴吟诵当场挥毫

郭老送翁植耘同志条幅





一九四一年七月郭老回国四周周年纪念晚会签名



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经历四年半战斗之后被解散纪念晚会签名

目 录

- 2508/07
- 一 文化堡垒.....翁植耘 (1)
——回忆郭老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附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时有关新闻报导
- 二 从“现代戏剧学会”到“重庆新中国剧社”
.....屈 楚 周特生 (74)
- 三 回忆民主报.....冯克熙 (84)

文 化 堡 垒

——回忆郭老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翁植耘

久别天官府，寄庐今尚存。
危楼经寇弹，破壁透朝曦。
抗日争民主，通宵草《屈原》。
呼儿牢记取，饮水要思源。

这首题为《访天官府寄庐》的诗，是解放后大约1951年郭沫若同志访问重庆时写的。诗后有注：“天官府六号乃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处，余租住四号院中靠西一晋的三楼，余租二间，过道一间。屋经敌机投弹震裂，粉壁成半裸体的竹箴，夏季热不可当；但周恩来同志每召集民主人士或文化工作者在此座谈，有时竟多至六七十人，恒夜以继日。我的《屈原》、《虎符》等剧均在此屋中草成。该屋现改名‘天庐’，乃解放后居者所命名。”文化工作委员会会址是七号，郭老此处误作六号，后来他在序《杜国庠文集》时改正了。

抗日战争八年，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在重庆盘踞了六年半；加上胜利后一年，一共七年半。当时重庆称作“陪都”，

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天官府街在重庆市内通远门附近的半山上。说起抗日战争年代的天官府街四号和七号，当年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凡到过重庆的，几乎无一不知晓，而且大都到过那里。因为那里是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大本营，是坚持抗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懈斗争的重要基地，又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指挥下贯彻党的文化工作路线的公开工作的司令部。不少同志和朋友，曾把天官府和重庆郊区的赖家桥（文化工作委员会郊区办公处和郭老乡居所在地），称作重庆这个国民党政府战时陪都内的“解放区”，称作“小延安”。我们一些参加过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人员，对这些地方，对天官府和赖家桥，自然更具深情。郭老本人，解放后也曾不止一次去探访那些故地。每当郭老去时，当地附近的居民群众，都倾家而出，聚集在郭老周围，像欢迎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热情欢迎我们这位为革命为人民奋斗终生的大诗人、大文豪。

一 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前身——政治部第三厅

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前身是政治部第三厅，1938年4月1日成立于武昌县华林。第三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专司抗日宣传工作。筹建时，郭老无意就任厅长，因为他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害怕民众，怀疑这个机构建立后是否能有工作可做。但周恩来同志的看法不一样，一方面是他对宣传工作特别重视，一方面他总是力争在一切可以开展革命工作的地方打开局面。因此一再劝说郭老：“不要把宣传工作看低

了。”还说：“我倒宁愿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但国民党不会同意。说实话，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考虑做副部长，否则就毫无意义。”这话把郭老说服了。于是，周恩来同志和郭老就先后就任了政治部副部长和第三厅厅长，而且立刻团结了大批大批的革命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其中有很多著名的杰出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以及史学家、国际问题专家、著名的教授、学者等，阵容无比坚强。如胡愈之、田汉、洪深、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张志让、洗星海、张曙、徐悲鸿、傅抱石、光未然、董维键、曹荻秋、叶籁士、马彦祥、应云卫、郑君里等都先后担任过第三厅的干部。当时第三厅的机构相当庞大，有三处十科。外有四个抗敌宣传队，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电影放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还有分散在各地的战地文化服务处。一时把武汉三镇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盛况空前。其冲击波迅速扩大，直达全国各地。

关于第三厅筹建经过，以及建立后第一炮一立刻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祝捷宣传周”和轰动整个武汉的献金运动的热烈场面，郭老在他的《洪波曲》一书中也作了详尽生动的叙述。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中原进攻，国民党当局从武汉仓皇撤退，又在长沙放了一把丧尽民心的大火。第三厅的文化人，从武汉、长沙、衡山、桂林、贵阳一直转移到重庆，经历了十分艰难的历程。郭老的《洪波曲》写到桂林张曙同志遇难为止。在武汉时，第三厅的宣传工作迅速推开，群众迅速动员起来的情景，就已把国民党吓坏了。当时的宣传周，就曾演出过国民党反动派假放空袭警报、解散群

众大会的丑剧。其后国民党处处拖第三厅的后腿。武汉弃守后，在转移途中，国民党就提出要压缩编制，精简机构。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郭老趁机把第三厅的相当大一部份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地工作，留下少数人参加桂林行营政治部。到了重庆之后，国民党进一步裁减经费，裁减人员，撤去“处”一级，只剩下四个科。宣传队和演剧队都下放到各战区，让他们在各地独立作战。随厅的只剩下一个孩子剧团。四个科分掌文字宣传、艺术宣传、对敌与国际宣传和印刷发行等总务工作。由杜国庠、洪深、冯乃超、何公敢分任科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分城乡两地办公，城里在两路口一个中学里，乡下在歌乐山西金刚坡下的三塘院子，（现名香蕉园）距离赖家桥很近。大部份工作人员集中在乡下，编写宣传提纲、书刊，创作抗日宣传画和救亡歌曲、戏剧等。可是连这么一点点的抗日宣传工作，国民党反动派还不让放手做。他们设置种种障碍，一步步剥夺第三厅的权力，甚至本来属于第三厅职司范围以内的工作，也逐渐被剥夺了去。譬如，第三厅编写绘制的宣传品，本来自己负责印刷和发行，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三厅在武汉时曾把武汉各界的献金划出一笔到香港买来一批卡车，可以把宣传品运送到各地，通过战地文化服务处发送到各战区的前方和后方，发送到人民群众和士兵手里。但到了重庆不久，发行工作被划出去了，卡车被劫收去了，各地的战地文化服务处被次第撤销了。之后，印刷工作又被划出去了，说这些都是总务厅的工作。最后，作为政治部一个部门的第三厅编写出来的宣传品，无分大小都必需送到部长办公厅审查。这一切说明国民党是怎样用尽心计来捆

住第三厅的手脚，不让第三厅有所作为，经过种种限制，编写出来的宣传品往往头一关就很难通过审查，有时竟是被删改得令人啼笑皆非。即使通过审查的宣传品，往往也是压着不付印；即使印好了也不及时发行出去。这样重重扣压，第三厅的工作实际上已很难发挥作用，当然更不用说发动群众了。可是反动派对第三厅还是不放心，还是要时时处处继续不断用种种方式进行阻挠和刁难。这是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革命策略的一个侧面缩影，而我们则备受其苦！

当时反动派压迫第三厅的恶毒手法之一，是劝诱和强迫第三厅的工作同志加入国民党。在政治部迁渝后不久，他们曾计划陆续抽调第三厅人员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中央训练团是国民党中高级干部的调训机关。到中训团受训，对国民党军政机关的人员来说是向上爬的梯阶，是求之不得的。但第三厅的同志却是谁也不愿踏进去，特别是进去后就必须加入国民党。因此，第一次调训，刘希宁同志被部里指定去受训时，他就悄然离职，以示抗议。当时国民党已在全国各地推行所谓集体入党的办法，第三厅当然不予置理。到1940年夏秋之交，反动派通过第三厅里个别国民党员，在厅里制造舆论，说什么“拥护三民主义就必须加入国民党，否则就是假拥护。”与此同时，混在第三厅里的国民党员华以松等暗中活动，在每人办公桌上放了一张国民党入党申请书。可是除了个别做抄写工作的司书和投机分子外，这些申请书都被同志们丢进字纸篓，一时空气相当紧张。郭老那时恰好回到三十年未归的乐山故乡，闻讯就赶返重庆。在三塘院子召

开了一次全体大会，严词斥责国民党的卑劣行径，最后郭老说：“我们无论在党不在党，报国的精神是一样的；我们无论在厅不在厅，服务的精神是一样的。”暗示反动派，你们如果再玩弄这一套，那么我们三厅的同志可以离开这个单位，抗日救亡工作我们到处都可以做。

国民党反动派一计未成，又生一计。1940年秋初，张治中奉蒋介石之命把郭老调到部里任政治部部务委员，名义上比厅长还高一级，实际上是架空。与此同时，委派了何浩若为第三厅厅长。这一消息公布后，第三厅的工作人员除极少数国民党员和司书、雇员外，几乎都上签呈请长假，这是当时提出辞职的一种形式。大家都表示与郭老同进退。张治中和何浩若没料到这一着，面对这一大叠辞职书，不知如何才好。何浩若急急忙忙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又是拉又是捧，甜言蜜语，要“慰留”大家，遭到冷冷的拒绝。于是他又在表示与郭老同进退人员中，找出个别与国民党高级官员有亲戚关系者，去作“恳谈”，希望“留下来襄助和帮忙”，为他们装点门面，借此打开缺口，并用“越级提升”为诱饵来笼络一些人，但也告失败了。这一坚决与郭老同进退的行动，当时完全是自发的，显示了以郭老为首的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团结一致，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使国民党陷于尴尬的境地。

二 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建立

正当国民党感到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直接找了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这些爱国文化人给你

们做抗日工作，有什么不好？你们不要，我们要。我们包下来，让他们统统到延安去。”这一下，反动派吓慌了。他们想，这不成了“放虎归山”吗？同时，他们对社会上的舆论也多少还有些忌惮。于是赶忙下令另建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老担任主任委员。由政治部管辖，^①拨给经费，但不在正式编制之内。同时还附带了什么“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的条件。当时凡表示与郭老同进退的第三厅工作同志，一部份在党的安排下转移到其他单位工作，少数自行改到他处任事，其余都进了文化工作委员会。

文化工作委员会于1940年9月份筹建，10月初正式成立。那天，郭老假座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抗建堂”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招待会。当时重庆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差不多都到齐了。有些属中间或甚至偏右的，只要有抗日要求，也有一些应邀前来参加这个盛会。那天晚上，抗建堂里水银灯下摆宴四十余桌，参加者四百数十人，这在当年重庆已是极大场面了。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邓颖超同志与曾家岩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章汉夫、陈家康、吴克坚、徐冰、石西民等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也都来参加。因此，这次盛会不仅显示了以郭老为核心的进步革命文化界的力量的强大，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强大。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第一炮又把反动派杀个下马威，招待会成为一次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强有力的示威！

郭老在招待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的讲话大致内容是：“抗御日寇侵略主要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军事战线，

一条是文化战线，一条用枪，一条用笔。必须枪与笔相配合，才能战胜强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推行它的奴化毒化政策，汉奸文人卖国投降，媚敌求荣；但我们这边，除部分地区（指解放区）枪与笔是密切相配合外，在大后方，在抗敌阵营里，却还有人在军事上按兵不动，甚至对销自己的力量，在文化上也是钳制压迫，害怕民众，与日寇汉奸遥相呼应。真令人难以容忍！在座的都是文化战线上的战士，多年来一直用笔在和敌人战斗。今天我们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就是要组织一支队伍参加这条战线，以便更好运用力量，同大家一起战斗！”最后郭老又引用了周恩来同志当时经常提到的：“一定要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战！”“坚决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反对投降！”

这次盛会留下了一件珍贵的纪念品，就是到会的全体文化界人士的签名。当时招待会入口处摆了两只大桌子，上面各铺一整张宣纸，以备与会者签名。周恩来同志蒞临时，纸上已不少人签名，招待人员把笔递给他，请他把名字签在前面。周恩来同志一向谦虚，他接过笔在宣纸后边的边缘上签上了笔迹为大家所熟悉的名字。后来裱成横轴，两张大宣纸并在一起，周恩来同志光辉的名字恰好在横轴的正中，形成“众星拱月”的布局。横轴前面郭老本已题“招待陪都文化界新闻界题名”，装裱时郭老又加题了一首七律，记得上半阙有如下几句：

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华烛竞辉煌，

慰劳血战三杯酒，鼓舞斗志万丈光。

第四句可能记忆有误，下半阙已记不得了。

横轴裱就后，田汉同志诗兴勃勃，又在后边题了一首诗。诗句也记不得了，诗的内容大致是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文化人政治上受压迫，没有言论自由，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生活上也毫无保障，大家“都有一把辛酸泪。”全诗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

这幅签名横轴一直挂在天官府街七号文化工作委员会楼下中间厅堂左侧墙上。每当大家看到这幅围绕着周恩来同志光辉题名的签名轴时，就感到他一直在我们中间，就感到有一股力量鞭策着大家前进！事实上周恩来同志那时虽然已不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但他仍然同郭老一起自始至终领导着文化工作委员会。

1945年文化工作委员会结束时，冯乃超同志把这幅签名轴交给笔者保存。日寇投降后，笔者从四川东返上海，运载行李的船在长江的险滩中翻了，行李总算捞了上来，这件珍贵的富有纪念意义的革命文物，落水后又请裱画店重新装裱过，一直珍藏着。可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件文物给抄走了。费了很多周折，一年前才查到已汇缴上海市图书文物清理小组，然而迄今尚未清理出来。本来是很想摄影制版作为附件刊在本文里面的。

三 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和人事安排

文化工作委员会设专任委员十人，兼任委员十人。他们是：茅盾、老舍、陶行知、沈志远、张志让、邓初民、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马宗融、吕霞光、卢于道、黎东

方、胡风等知名人士。在主任委员郭老下，设副主任委员二人。一个是阳翰笙同志，他一直是郭老的左右手。另一个是谢仁钊。谢是国民党党棍，是国民党派来安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内部的钉子，是派来专门监视郭老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人员的一举一动的。他原任国民党的国民外交协会秘书长，到文工会后全然孤立，无所作为，不久即辞职；后来国民党又派来李侠公担任副主任委员。李侠公到职后就找郭老密谈，坦率地说明自己被派来监视郭老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活动，特别是监视同共产党联系的情况，自然这又是蒋介石授意干的。李侠公干脆把秘密手令拿出来给郭老看，这使郭老很感动。并说：“得道总是多助，而失道总是少助的。”

文化工作委员会内部设第一组（国际问题研究）、第二组（艺术研究）、第三组（敌情研究）。第一组组长原定国际问题专家张铁生担任，未到差，由蔡馥生代。一组成员有叶籁士、乐嘉煊、霍应人、先锡嘉、徐步、高植、石啸冲、钱运铎、翁泽永、黄序庞等。第二组组长田汉兼任，成员有石凌鹤、贺绿汀、李广才、光未然、卢鸿基、李可染、丁正猷、王琦、臧云远、白薇、安娥、柳倩、龚晓岚、刘巍等。第三组组长冯乃超，成员有廖体仁、蔡仪、朱洁夫、郭芬为、绿川英子、刘仁、康天顺，林曦，李嘉等。分城乡两地办公，城办秘书罗髻渔、乡办秘书何成湘。平时，驻城工作同志较多；到了暑期，郭老到赖家桥居住，不少同志也随同下乡工作。

天官府街说它是一条街，其实除一家小牛肉馆，一家小烟杂铺和小茶馆外，其他什么铺店都没有。它只是通远门内

领事巷一条拾级而下的坡道，而且经 1939 年五三、五四 敌机大轰炸，到处疮痍满目，瓦砾成堆。天官府街七号，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会址是一座三层重庆式的洋房，所谓重庆式是指外表上看还漂亮，实际上不用水泥钢筋，甚至不用砖砌，只是竹篾架子糊纸筋石灰。所以一点不结实。七号同法国领事馆贴邻，可能日机轰炸时旁边有法国旗，所以当时房子相当完整。楼房前有一个狭长的天井，底层中间有一间厅堂，两边是总务部门办公室和餐厅；二楼全是办公室，中间是二组，一边是主任办公室和委员室，一边是第一组和第三组办公室；三楼中间是会议室，两旁是宿舍。楼房靠大门一边另有一幢二层的偏屋，作传达室、警卫室和厨房之用，楼上是收音室。四号郭老的家，从外表上看房子已极不完整，很多地方经敌机破坏后都没有整修，围上一段段竹篱笆，四周满目断墙残壁。郭老住三楼，共三间。一边是郭老的书室兼办公室，一边是他和夫人于立群同志和几个孩子的卧房，中间一间会客和吃饭，实际上只是一间过道。这寓所，不少朋友戏称作“危楼”，郭老自己则戏称为“蜗庐”，实在是很小，简陋朴素。但郭老在这里从 1940 年冬到 1946 年春，足足住了五年半。重庆夏季奇热，“蜗庐”尤甚，因此每届暑期，郭老总挈眷下乡，在赖家桥住三四个月。文化工作委员会驻乡办公处和郭老的乡寓在同一个叫“全家院子”的大院落里。在成渝公路上的赖家桥旁，离市区约五十公里。同原来第三厅驻乡办公处的“三塘院子”相距不远。赖家桥这地方山水清丽，景色宜人，可惜当时那么多画家，却没有把金刚坡和赖家桥写在画布上，摄影工作者也没有留下镜头，